

136-2

中山
文庫

和平之條件

Edward Hallett Carr 著
王之珍 譯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Edward Hallett Carr 著
王之珍 譯

中山文庫
和平之條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

(32131 滬報紙)

中山和平之條件一冊

Conditions of Peace

定價國幣叁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譯述者

編輯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Edward Halliott Carr

王之珍

中山文化教育館

重慶白象街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序

在戰局千變萬化之中，研究國際問題，著者明知是一件冒險的事，相信讀者當亦具有同感。此次戰爭，乃至未來和平，其根本問題的性質，未嘗改變，將來也不致改變。但是隨着戰場上每一嶄新的發展，我們藉以觀察這些問題的景象，以及爲應付這些問題所預定的方策，也不免有所變更。因此，著者必須指出，本書大體形態，在蘇聯參戰以前即已決定，且有不少已經寫出，蘇聯的參戰，使本書所要討論的若干問題爲之變質；迨本書付印之際，美國日本又相繼加入戰團。本書末尾數章，對於政策的討論，本屬探討性質，著者曾於第七章之首有所申明。不過，因爲上述的理由，此項申明，更格外值得注意而已。

一九四二年一月卡爾

目次

序

導言

第一編 根本問題

第一章 戰爭與革命

第二章 民主政治的危機

第三章 民族自決的危機

第四章 經濟的危機

第五章 道德的危機

第二編 英國政策提要

第六章 英國國內政策

第七章 英國與世界

第八章 英國與歐洲

第九章 英國與德國

第十章 新歐洲

和平之條件

導言

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突然爆發以前，文明世界，在大體上，本是繁榮安定的世界。當時充滿了自足與有理性的樂觀情緒，又因回顧過去百年，差堪自慰，遂相信進步乃文明人類生存上的正常狀態。當時對於戰爭並不看作人類誤入歧途的象徵（因為那幾乎是不能想像的事），而祇看作一種使人震駭毫無意義的變態。哈里伐克斯曾說：『……在一九一四年時，我們確信，當時遭遇的問題，一旦得到解決，世界又可回到舊日的狀態，那種狀態，大體上，我們認為是良好的』。（註一）其實，即在恐怖的經驗之中，我們也可以找到樂觀的種子。上次大戰的末期，大家有一個流行的信念，即協約國勝利的結果，必將產生一個較前更為良好的世界，使民主政治克保安全，英雄人物得以安居，而且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將能保證普遍公道與永久和平。這種觀念，在當時並不感覺其有什麼革命性。因回復舊日狀態，既然就是回復良好狀態，則人類進步，自然又可循序發展。斯末次將軍在一九一八年所寫一段時常被引用的文字中，曾謂：『人類無疑的又在移動了。……帳幕業已撤除，人類浩蕩的行列，又在前進了』。（註二）

可是這個幻景，即人類重新向着更良好世界長期前進的幻景，等於曇花一現，未能持久。在巴黎和會悠長的歲月中，它就開始模糊，到了一九二〇年第一次戰後經濟恐慌出現時，它就完全消滅了。各戰勝國厭戰的人民，一經放下了武器，似乎也就拋棄了他們對於未來世界的崇高志願。他們仍為回復舊日良好狀態一觀念所困惑，故不復視戰爭之終止，為回到一度受阻的努力進步之道路，而視為回到一種靜止狀態，其中將有不須費力自動發展的繁榮。他們已不再期望或要求一個開啓天堂的鎖鑰，而卻沉緬於舒適安樂聽任自然的心理。奮鬥不

懈的改革家路易喬治卸任了，接替的是吸着和平與安全煙斗的包爾溫。新秩序的先覺威爾遜下台了，繼起的是恢復『常態』的哈定與柯利芝。安全只常態成了當時廟堂的兩大支柱。而兩者的解釋，仍不出一九一四年以前晏安時代的範圍。二十年來，這種故步自封與守舊回顧的見解，實代表着對凡爾賽和議負責最重的三大國家的態度。（註三）

至於所謂『不滿足』國家，其心理上的反應，卻大大不同了。在這些國家之中，德國是唯一戰敗的強國；蘇聯則進行着一種革命，與和約所要永保的整個政治、社會、以及經濟制度，恰恰相反；義大利是因不滿於本身所得的勝利收穫，而被騙入敵對的陣營；日本因過去五十年的成功，採取持重保守的政策，但以嫉妬英美在太平洋勢力之故，也側身於不滿足國家之列。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是能對過去滿意的。所謂滿足國家，還是一味憧憬他們過去得勢與昌盛時代的狀況，卻常常未能認清，這些狀況早已過去了。不滿足國家每居於革命者的地位，以新理想的號召，對過去一切加以抨擊與反抗。我們可以從滿足國家與不滿足國家，對於軍事，政治，以及經濟問題的個別反應中，觀察兩次大戰中間二十年來的心理背景。

滿足國家的守舊回顧思想，在其軍事領袖們的態度中，表現得特別顯著。陸海軍事人員，都一致殷切固執着十九世紀作戰的光榮傳統。在他們眼光中，一九一八年戰勝以後，未能保證安全的，莫如將時針撥回，至少讓它停住不動。在一九一九年和會中，英美參謀本部的計劃，有兩個主要的要求：廢除潛水艇與制空軍軍用航空。祇要能把這兩種重要的新式作戰武器取消，那就可以回到十九世紀戰略上那種習慣的與如意的部署了。在軍縮會議中，英國曾再度提議廢除二十世紀的武器：潛水艇，巨型坦克車，毒氣，與空中轟炸。其終英國歷屆政府因對空軍可能發揮的威力，過度重視，以致英國空軍，在某一時期，竟退居世界第七位。英國皇家空軍，歷史最淺，在作戰部隊中也最屬次要。（註四）美國人認為英國海軍力量，必須三倍於德國；但在空軍方面，則祇求與德國相等，可是就連這點，也沒有做到。一八七一年普貝爾納曼為反對擴大陸軍曾聲辯說：『海洋可以給我們時間』。（註五）過了六十多年以後，此項因素，依然未變。英國如能控制海洋，則其二十世

紀霸主地位的穩固，必與十九世紀無異；可見英國人對於順應任何其他新見解的心理是很紆緩的。

法國戰略的守舊，更較英國爲甚。法國向一九一九年和會所提出兩個關於保障安全的著名備忘錄——一月十一日『福煦備忘錄』與二月二十六日『泰欣歐備忘錄』——論及運輸問題，完全以鐵路爲限；對於空中力量竟隻字未提。在兩次大戰中間，法國的一項重要戰略觀念，是馬其諾防禦——想固定作戰地帶，想永久保持現狀。在這個全部時期中間，英法兩國參謀本部似乎毫不躊躇的假定將來任何陸地戰爭，其主要方式，必然是固定的陣地戰，因爲上次戰爭便是這樣，這是有充足根據的。一位有先見的法國評論家，在一九二八年就抱怨說：『我們所準備的一切好像是：凡爾賽條約雖已強使德國的軍事觀念現代化，卻許我們回到一九一四年的常規，然後高枕而臥』。（註六）我們對弱小的滿足國家的軍事策略，若加以同樣的非難，也許有失公允，因爲她們缺乏資源與創造能力，所以態度偏於保守。荷蘭與比利時都不能領會，一個陸軍如果沒有空軍與相當有力的機械化部隊的協助，它在現代戰爭中是站不住的。波蘭的戰略予騎兵以重要任務；瑞士則將其防禦計劃，建在民軍之上，他們都是腳踏車隊，並以個人勇敢及步鎗射擊準確著稱的。

因爲滿足國家的戰略，兼受了十九世紀成見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經驗的支配，於是一切主動遂移屬於敵對集團。飛機本是法國發明的，坦克本是英國發明的。然而在兩次大戰期間，德國軍隊經過苦心經營之後，已完成了空軍與機械化部隊的戰術，而英法兩國的軍事心理卻依然脫不了過去的規律與習慣。空運部隊在敵後降落，乃出於蘇聯的創作，經德國研究而益臻完善。滿足國家對此卻全然未加理會。一九一九年德國軍備與整個軍事機構的完全被毀，卻使德國占了莫大的便宜，這絕非言之過甚——因爲在這種情勢之下，使得她不但要現代化她的器材，且不得不從頭重新考慮每一個裝備與編制問題；而英法兩國則依舊陷溺於過去的方式，不知自拔。（註七）所以一旦戰事發作，德國的新奇戰術，使英法參謀本部震驚失色，不知所措。泰晤士報曾謂德國軍隊『準備着冒犯各種危險，此種冒險性質，姑不論對與不對，就英法軍事理論而言，是在所痛斥的』。（註八）過了幾天之後，法國總理又說：『事實昭示，我們關於作戰的傳統觀念，今已遭逢了另外一個新

觀念』。(註九)此次戰爭第一年中，最堪重視的事實，還不單是德國一直在保持着攻勢，而更在每一個戰略上與戰術上的新花樣，每一項重要的軍事發明，總是出於德國方面的。(註一〇)從技術方面說，革命的戰爭觀念，已經戰勝了純粹保守的作戰觀念。

滿足國政治家們之一味注意過去，也正不讓於其陸海軍人員。一九三四年一位對英國政治生活的獨立觀察家寫道：『我們對於刷新政治或創造思想，顯然無能爲力，此乃是現代政治上最可憂慮的現象』。(註一一)一九一八年所要使世界安全享有的民主政治，乃指特殊形式的自由民主政治而言，亦即在十九世紀特殊狀況之下長成的民主政治。就其爲這一種民主政治而觀之，當然已因時移勢易，不復成爲一個生氣勃勃的力量。所謂民主政治，專靠着一個光榮傳統的威望，除了它過去的成就以外，似乎再沒有旁的東西，可以對新世界的問題有所貢獻。它成了富有人們與享受特殊權益階級的特權；祇有他們能把過去與現在，認爲相當滿意的。就一九三九年而言，世界上十多個國民收入平均最高的國家中，都保存着民主政府，在別的國家，則不管沒有民主政治。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沒有人想到重新解釋民主政治，以應合戰後世界的條件，而在民主國家中，也很少有人認清，今日民主政治的措施，不能繼續與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一樣。到了一九三三年以後，美國輿論，雖曾一方面遭受相當的反對，開始轉向一個極端新穎的民主政治觀念前進。(註一二)可是在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以前，此項運動，還未能傳播歐洲。在政治方面，猶如在戰略方面，我們當時殊難想像任何事物，可以把十九世紀的光榮與安樂的日子，永遠了結的。

因此政治上的主動，也操在不滿足國家之手。第一個取得這種主動的就是蘇聯。自一九二一年起，各國紛紛仿效蘇聯榜樣，一面反抗凡爾賽和議，一面又反對民主政治；有時並像蘇聯人士所爲，它自稱要建立一個新的完備的民主政治，對民主政治稍示口惠。布爾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其所以富於誘惑力之故，并不在其模糊晦暗，具有彈力，有時甚至目相矛盾的理由，而在其表面上提供了新的東西，並且不求他們的信徒崇拜過去的政治理想。這個新政治秩序，和新戰略一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前尚未經過

試驗。總之，一個傾向革命的心境，恰與一個滿意政治與懷戀過去的心理，互相對立。

這種對立，在國際事務方面，表現得更為顯明，且更富有戲劇意味。這裏滿意現狀的保守國家，和企圖推翻現狀的革命國家，發生了直接的利益衝突。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瀰漫着樂觀的空氣，到了一九二〇年，以後，又入於靜止的滿足，此種反動，所給予國聯的突然打擊，實較任何制度所受者為甚。國聯是在熱烈崇信人類進步的心情下產生的，它應該是促進人類進步的主要工具，可是不久就成了滿足國家的御用法寶，這些國家在和會中甚至細心下意的閹割了盟約唯一激進的條款，嗣後每一次『加強』盟約的努力，就是對於維持現狀進一步的保障。日內瓦議定書可說是政治上的馬其諾防線。使日內瓦的溝塹牢不可破，靜候敵人來攻，這是當時政治智慧的絕頂。滿足國家，也和其他特權團體相同，堅信和平的極度重要，有意的渲染戰爭的可怕，就好像國內保守份子，渲染革命的可怕一樣。『沒有什麼特殊的情勢，沒有任何個人的企求，無論其理由如何充分，可以容許超過和平的利益。和平必得盛行，必須凌駕一切。如有提出任何公道的行為，而同時足以擾亂世界和平，並重演昨日慘劇者，則我必將首先要求提倡的人們，為着和平的最高利益，立即停止與放棄』。(註一)這段話是正當國聯鼎盛時代，白里安對法國衆院說的。換言之，與其損害了現行秩序的神聖權利，毋寧讓不公道固持不變。一位擁護國聯的英國人曾說：『國際聯盟的宗旨首在防衛會員國家——自衛乃是任何組織的生命第一條公律』。(註二)『安全』的迷戀，成了繫在國聯頭上的磨石，使它再也透不出一口新氣息，再也長不出一毫新體力。在政治上日內瓦已成了純粹保守主義的大本營。梅特涅的格言是『祇管統治，不要變更』。國際聯盟固然沒有變更任何事物，但連統治也失敗了。

因此之故，每一個有關國際變更的運動，都是從不滿足國家發端，而立刻就與現狀下的既得利益對立。誠然，若干期望的變更，是具有破壞性質的。然而其他方面既有提出任何建設性變更的建議，或且不肯承認有變更的必要，那就無怪反對現狀派乘虛而入了。最初國聯從其激進與理想主義的來源中，所遺留下來的威望，不久就枯竭了。政治的攻勢，和戰略的攻勢一樣，也完全轉入不滿足國家之手。

在經濟方面，滿足是比較難說的，無爲的政策，也比較不易維持。從政治方面說，現狀的破產，在一九三五年前後，還沒有完全暴露，或得到大家的公認。從戰略方面說，滿足國家的純粹保守態度，直到一九四〇年的軍事悲劇發生以後始被打破。可是在經濟方面，這個破隙來得較早。一九二〇年的第一次經濟恐慌，近經產生了普遍的不安，而賠款的糾紛，與魯爾的佔領，更使不安的情形加重。即在軍事優越與政治安定的全盛時代，經濟危險的惡魔業已抬頭。一九二四年在日內瓦議定書方告簽訂，與高采烈之際，一位出席國聯大會的法國代表，即曾公然提出下列警告：

我們如欲永久安享和平，則國聯的財政與經濟組織，以及國聯大會，對於原料分配、市場、及移民各項重大問題，終有一天必須加以處理。如果不予解決，——我們切莫犯這種錯誤——必將造成內部的分裂，而使我們艱辛締造的大業爲之傾覆。（註一五）

穩紮穩打，儘可作爲軍人與政治家的座右銘。可是不幸它不能作爲經濟的萬靈藥。在經濟方面，保守是不夠的，因爲連一個類似滿意可以保守的現狀，也並不存在。經濟問題是迫切的，並且閃避不了的。那麼，有什麼救濟辦法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滿足國家守舊回顧態度的全部表現。對於進步的信仰，業已死去。如果保持現狀，不能得到經濟繁榮，如果變更無可避免，那麼，變更可取的方式，祇有掉轉頭來向後走了。如果保守是不夠的話，那就祇有反動了。經濟人已不再循照未開的新路線，朝着一向高不可登的地點進發。此時的目的的是挽回一個錯誤的行動。把從前所做過的統統廢掉，把一九一四年以來美麗的一頁所寫下的一切事物，一一勾銷。回到過去，即認爲是回到『正常的』繁榮。一位觀察家在一九二四年曾經寫過：『一旦恢復正常狀態以後，即卡那是可以有絕對成功把握的』。（註一六）另外一位評論家也說：「事業家們一心期待著『常態』的恢復，他們並且相信，常態就是一九一三年以前的世界」。（註一七）在這極端不幸的空氣當中，就是當時誇爲進步標誌的措置，就長期的回顧看來，也成爲純粹的反動了。譬如道維斯計劃，似乎是處理賠款問題很開明的辦法了。可是

論其要旨，還不外是一種反動的手段，想把十九世紀畸形的私人國際資本主義復活，不過把資本中心，由倫敦移到紐約而已。到了一九二九年，美國財政家們發覺負擔太重，於是經濟革命的暴風雨，席捲全球，再也沒有躲避的餘地了。

雖然如此，迷戀過去，依然非常得勢。我們試回想在兩次大戰中間，多少經濟的口號都冠以 *re* 字頭，這不能不說是一樁奇事吧。我們所關涉的問題，如重建 (*reconstruction*) 緊縮 (*retrenchment*) 賠償 (*reparation*) 歸還戰債 (*repayment of war debts*) 重定貨幣價值 (*revaluation of currencies*)，恢復金本位 (*restoration of the gold standard*)，復興 (*recovery*)，與澈除貿易障礙 (*removal of trade barriers*) 等等，真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就連通貨膨脹，也可以改稱『通貨再膨脹』(*reflation*)，那就覺得堂皇多了。英國有一位國際經濟關係專家，在四十年代寫過兩部書，第一部名為『復興』，第二部名為『安全：它是可以回復的嗎？』(註一八)。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三三年兩次國際經濟會議中，專家們所表現的經濟世界的集體智慧，都是啓示我們說，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差不多所有經濟政策的趨勢都是錯誤的，是應加以阻止或矯正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推托說，各滿足國家的財政經濟當局，總是聽信他們經濟顧問回復十九世紀原則的說詞。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前，各滿足國政府對於經濟正統學說，的確還是口頭上一味保持，但事實上已不免有所變通。可是從一九三一年以後，連這一點口惠都暗淡了，各國政府已被經濟的颶風驅上前所未有的新徑。然而，卻有一點，值得注意：這是在環境壓迫下一種偶然的行動，反乎一般公認的經濟學理，至於那種學理何以失敗，以及應由何者代替，卻還全然沒有了解。提倡這種新政策的政治家們，是站在防守方面的。新的途徑祇是認為一種暫時的無可奈何的需要。其所以採行之故，端在應付『不正當的』競爭。不管表面上如何，它祇會增高，而不會限制，國際貿易的數額。它還是爲最後回到經濟正統開路的，這些荒誕可笑互相矛盾的解釋，祇有一點是重要的。政治家們對其所提倡的政策，既無了解，又無信心。他們已失了主動，且被他們所無力控制的強大勢力驅入徘徊、迷惘、啼笑皆非的境地。

在這種狀況之下，關於經濟的發明能力，如同軍事的發明能力一樣，祇有不滿足的國家才是知道尊重與應用的。在兩次大戰中間，把經濟世界改頭換面的許多改革，結果好壞，姑且不說，都是由反對現狀的革命國家所創獲與發展的。『計劃經濟』——由國家規定并組織全國經濟生活，以迎合整個社會的需要——可以說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中各主要交戰國中（當然要首推德國，這個名詞，也是德國創始的）就出現了。但英、美、法三國在戰後急於放棄國家統制，企圖回復戰前放任主義而歸於失敗，另一方面，始則蘇聯，繼則法西斯義大利與納粹德國，在『計劃經濟』之中，發現了二十世紀的新概念，卒代替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這些國家既已取得主動，保守國家最後也被迫不得不勉強隨着前進。由國家統制對外貿易，且用此為政治武器，此係創始於蘇聯，而完備於德國；到了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之際，英國在德國強大壓力之下，始朝着這個方向緩緩前進。當英美兩國對於管理貨幣與統制貿易尚在鄙夷痛恨之時，各不滿足國家，對其中各項技術問題，業已精心研究。當然，需要乃是發明之母。但是誰最初感到這種需要，每因其進取與革新精神發展的迅速，而得到莫大的便利。有些人士對於失業在蘇聯與納粹德國幾已絕跡的事實，竟輕囁的指斥說，其所藉以成功的手段，以及因此所作的犧牲，都不是滿足國家所能容忍的。這個答案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各滿足國家對其本身的失業問題，迄未能找到答案，而失業的嚴重性，是不容否認的。如果許多歐洲國家的青年，多信蘇聯或德國掌握着未來的關鍵，這是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根據新的原則提出新的經濟制度，因而啓露了光明的希望；而那些滿足國家的政治與文化領袖們，似乎除了回復那已充分證明業經破產的過去而外，再提不出什麼解決的辦法。滿足國家把緊要的經濟理論，與實際上有有效的主動，輕易的讓給敵對集團，其喪失本身威信，莫此為甚。祇有美國在一九三三年以後，才開始朝着一個新經濟的，以及政治的方向，踟躕前進，對於往時的理想，依然是有不少口惠的。

我們現在如從這個軍事、政治、與經濟的輪廓檢討過去二十年整個的心理背景，我們可以知道，滿足國家的態度，實受了幾乎一切特權與富有集團所通有的兩個觀念上的缺陷所惑。第一、特權集團總想把他們揚眉

吐氣的時期加以理想化，以爲保住這一時期的狀態，即能得到最大的利益。第二、特權集團偏執着本身安全問題，對於改革甚至進步的需要，反倒不大注意。穆勒在八十年以前就說過：『謂人類各項事務的改進，完全由不滿足的人物所做成，這是再確切沒有的』。(註一九)在滿足國家當中，特權團體，有權有勢，由來已久，而『不滿足的人物』則數量有限，勢力不大。英語國家特權的分佈，甚爲普遍，其政治制度的穩定，亦基於此。但在革命時代，特權人數太多，構成一項危險，即足以阻撓對於重大新需要的認識。

如此說來，對於此次戰爭行將勝利的國家，第一個教訓，乃在避免回顧過去，以求指導戰後和平方案的原則。此項教訓，應較一九一九年時易於領受，因爲我們已不像那時盲目信仰戰前世界的『舊日狀態』即爲良好狀態了。現在情勢中，最堪令人興奮的現象，就是在社會中，特別是在青年羣中，流行着一種深刻覺悟：即過去幾十年的世界，乃是惡劣與瘋狂的世界，這個世界中差不多所有的事物，都需要澈底根除，重新樹立。革命的潮流業已風行。不過，這裏也有許多令人憂慮的現象，其中之一，就是在英國公共生活中，占有關鍵地位的人，其平均年齡委實太高了。多數六十歲或六十歲以上的人，對於過去印象的感受，勝過未來的需要。今後青年人如仍繼續像目前一味仰賴老年人的領導，則恐難達其所希望的目的。英法之所以遭受一九四〇年的軍事挫敗，大半是因爲她們準備將上次大戰重演一番。今後的人是不是會說，我們祇因準備一個類似上次的和平，所以對於樹立和平重告失敗呢？

第二個教訓是同樣重要，也許更易忽略：就是如果過分偏重對付安全問題，勢將造成不幸的結局。這種偏執，常是特權階級的陷阱。一位知名的科學家這樣批評說：『統治十九世紀盛極一時的中等階級，過分重視了生存的安寧。……中等階級對於未來世界的悲觀，乃因他們未曾辨別文明與安全。在最近的將來，比諸最近的過去，安全要少些，穩定要少些。……就整個而論，偉大的時代，總是動盪的時代』。(註二〇)一味尋求安全，不免就成了一個反動的工具。『進步與安全的衝突』，費席爾教授曾在這樣標題的一本動人的書裏，加以討論；但其重要性，遠在他所特殊給予經濟上的適用以上。凡是研究國際聯盟歷史的人，總會知道，『安全』一

字，對於在日內瓦任何進步的運動，是有阻撓作用的。我們聽到一位現任國際商會主席美國事業家說：『給我們生活上最大滿足的東西，莫過於安全』，（註二）這真是駭人聽聞的言論。果真如此，我們的文明是注定要毀滅的。

安全或和平，都不能夠適當的作為政策的目標，這是大家所應知道，而尚不盡知的。費席爾教授在一本書裏說過：『個人安全好比快樂一樣，似乎不是容易直接尋求得到的。在一個進步的經濟體系中，社會穩定與個人安全，祇是尋求其他東西的副產物』。（註三）就是『國際和平也祇是這樣的另外一個副產物』。（註四）國際和平的取得，不能專靠簽訂公約盟約的手段，或以『法律禁止』戰爭，此猶我們不能以宣布革命違法的途徑阻止革命。任何一個時代，以和平安全為其主要目標，是注定要失敗的。在人類事務中，祇可得到一種像紡球或腳踏車的穩定。此次戰後，戰勝國如能創造可使人類社會循序進步的條件，則和平與安全行將自至。但是她們一定要記取這個奇異的教訓，就是安全的條件，乃在不斷的前進，戰後世界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種種問題，其處理的精神，不是求其穩定，而是求其革新。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警惕的。由上所述，我們已經看到，上次戰爭結束時所產生一種理想性的企求，如何條然消逝，轉為怠惰與自足。很自然的厭戰現象，加上個人回復『正常』生活的願望，把那建設新世界中大顯身手的空洞念頭，早就置諸腦後了。『各方面對於「復員」的要求，如此之強，以致各勝利國政府也不得不隨波逐流，俯從眾意。巴黎的政治家們，還未曾開始抓住他們的工作，而他們的大權已漸次削落了』。（註五）此次戰爭結束以後，厭戰的情緒，可能像上次一樣，而產生更為不幸的結果，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邱吉爾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就曾說過：『一國的真正能力，乃在於筋疲力竭之時，能做何事』。（註六）但這也多半要看是否能夠有一個政府，充分準備作明白決斷的領導；且若非事先就考慮政策，並細心擬定計劃，這種領導是不會出現的。這對於若干人士所稱，重建乃是戰後的工作，在戰爭尚未停止以前，就來研究重建問題，若非過早，即屬多餘，實可作為最有力的答覆之一。

- (註12) Viscount Halifax, Speeches on Foreign Policy, 1931-1939, p. 280.
- (註13) D. L. C. Sontz, The League of Nations: A Practical Suggestions, p. 18.
- (註14) 國際聯盟之組織與發展, 第三卷, 第三號。
- (註15) 參見 A. Salter, Security: Can We Relieve It? p. 1-3.
- (註16) 參見 T. A. Spencer,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 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 3, p. 73.
- (註17) 參見 Quoted from L'Ouvre by M. Werner,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Powers, p. 211.
- (註18) 參見 T. Noble, Imperial Germany, pp. 187-8.
- (註19) 參見 The Times (Leading Article), May 14, 1940.
- (註20) 參見 Statement to French Senate of May 21, Reported in the Times, May 22, 1940.
- (註21) 參見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Aug. 21, 1940.
- (註22) 參見 R. Perry, Government in Transition, p. 97.
- (註23) 參見 W. Tappmann, The Good Society, p. 225 and Passim.
- (註24) 參見 League of Nations, Ninth Assembly, p. 81.
- (註25) 參見 N. Ansell in the Futur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6), p. 17.
- (註26) 參見 League of Nations, Fifth Assembly, p. 279.
- (註27) 參見 A. Siegfried, Post-War Britain, p. 110.
- (註28) 參見 W. K. Hancock, 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II, Pt. I, p. 192.
- (註29) 參見 國際聯盟之組織與發展, 第三卷, 第三號。
- (註30) 參見 J. S.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 III.
- (註31) 參見 Sir Alfred Whitelaw, Quoted in B. L. Richmond, The Pattern of Freedom, p. 68.
- (註32) 參見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 352 (Sept. 1940), p. 828.
- (註33) 參見 A. G. B. Fisher, 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 p. 176.
- (註34) 參見 國際聯盟之組織與發展, 第三卷, 第三號, and the Spectator, Nov. 21, 1922, p. 733.
- (註35) 參見 A. J. Toynbee, The World After the Peace Conference, p. 2.
- (註36) 參見 Speech at the English-Speaking Union, Feb. 33, 1919, Quoted in R. Sargent, Winston Churchill, p. 169.

